

# 翻译与语言对比论丛

TRANSLATION AND CONTRASTIVE STUDIES: COLLECTED PAPERS

谭慧敏 林万菁 ◎ 编

南洋理工大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序

◎周清海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虽然独立了38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建设等方面，也都有了令人骄傲的成就，可是它也不能脱离移民社会的共有特点：一切事务的处理，都以求存为考虑的重点，因此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人文方面的建设。其实，在生存与温饱没有解决之前，是不能奢谈人文建设的。

过去的移民一般都没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因此在语文教育方面，虽然我们实行了40多年的双语教育，可是我们年轻一代语言自满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掌握了英语，就可以通行无阻，生活得很舒服，何必再化时间与精力去学习另外一种语文呢！母语的文化价值也因此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足以让年轻人好好地学好母语。和语言有关的研究当然不受重视，也因此被忽略了。

本书的导言说：

对于翻译，这里的普遍观念是，那不是一门专业，几乎任何有双语能力的人都可以胜任。对于语言学习，这里的普遍认识是，能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需要就好，精通与否另当别论。在多语的环境下，这里的语言学习似乎忽略了语言对比所提供的丰富资源。这里的用语者一般未能充分发挥多语的潜在优势，较少深一层去了解贴近我们生活的语言。因此，尽管接受了双语教育，但真正达到社会语言学中那般定义的“双语人”，为数不多。

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都与我们没有人文传统有关。如果精通双语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象征，好的翻译人员，便能受到尊重。如果能承认自己对别人所熟悉的学术领域的无知，便更能尊重别人的学术成就，也就不会自认对一切都是内行。强不知以为知，是貽笑大方的根源。但我们却处处存在着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风气，不尊重别人的成就，更不能欣赏别人的成就，也因此削弱了我们的人文环境。

2001年，在“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献词》里，我说了如下的话：“从事比较研究时，对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区，所出现的看来相似的现象，如果只比较表面的相似，而忽略了本质的不同，就可能出现偏差。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这个看法，不只对历史比较研究是重要的，对于语言对比与翻译，也同样重要。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学术讨论批评的人文风气，许多流于表面的比较研究，都没有机会提出来讨论，研究者也就自满于自己的井中天地。

为了建设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一方面需要制造研究的气氛，鼓励研究讨论；另一方面也要尊重与欣赏别人的研究成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适合研究的环境，也才能有适合年轻人成长的人文环境。

林万菁教授和谭慧敏博士是师生关系，他们合作组编这本书，希望能在语言的对比和翻译研究方面，制造些许的气氛，让大家看到在语言方面，有多大的研究空间。他们的合作也表现了老师对学生的关怀与爱护，学生对老师的尊重。我忝为林教授的老师，后来也成为谭博士的博士生导师，同时又是他们的同事，我因此感到宽慰。一个人的

成长、成就不是一个老师所能造就的。当友人对我说到他的一个博士研究生，用了“我不是他的老师，他只有一位老师”这句话时，我心中为他产生了无限的悲哀。我也说不清这份悲哀是为这位退休的友人，还是为他的学生。

在组编这本书时，尤其是谭博士，相信也和书的編集一起成长。对年轻的谭博士，我心里有无数的期许：希望她在语言研究方面，能更上一层楼。

2003年9月15日

[周清海教授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兼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中文系教授]

|         |                               |     |
|---------|-------------------------------|-----|
| 周清海     | 序                             |     |
| 谭慧敏、林万菁 | 导言                            | 1   |
| 黄邦杰     | 翻译泛论                          | 11  |
| 潘文国     | 中国的汉英对比研究：一个世纪的回顾 [英文]        | 29  |
| 郑雅丽     | 语义的翻译 [英文]                    | 63  |
| 白阿丽     | 地狱篇在中国：但丁的地狱篇在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 [英文]  | 87  |
| 谭慧敏     | 从汉英对比管窥汉语名量词                  | 129 |
| 林万菁     | 汉英对比在词汇教学中的应用问题               | 161 |
| 赵伊露     | 语言的特殊性：第二语言词汇教学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英文]  | 175 |
| 俞鸣蒙     | 汉语“星”与日语“星(hoshi)”的语言及文化意义之异同 | 187 |
| 余丹      | 为自学者构思一个中译英学习模式               | 219 |
| 王永炳     | 元剧曲中的蒙古语及其汉语音译问题              | 233 |
| 潘文光     | 马来语中闽粤方言借词的语音变化 [英文]          | 251 |
| 周长楫     | 方言比较与方言词本字的考订：以闽南方言为例         | 267 |
|         | 作者简介                          | 283 |

|                                             |                                                                                                                    |     |
|---------------------------------------------|--------------------------------------------------------------------------------------------------------------------|-----|
| <b>Chew Cheng Hai</b>                       | Preface                                                                                                            |     |
| <b>Tham Wai Mun</b><br><b>Lim Buan Chay</b> | Introduction                                                                                                       | 1   |
| <b>Ian Wong</b>                             | Reviewing Translation in Perspective [in Chinese]                                                                  | 11  |
| <b>Pan Wenguo</b>                           | English-Chinese Contrastive Studies in China:<br>A Century's Retrospect                                            | 29  |
| <b>Cheng Ngai Lai</b>                       | Playing on Meaning in Translation                                                                                  | 63  |
| <b>Alessandra Brezzi</b>                    | The "Hell" in China: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Dante's<br><i>Inferno</i> in the 20th Century                         | 87  |
| <b>Tham Wai Mun</b>                         | An English-Chinese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the<br>Chinese Nominal Classifier [in Chinese]                          | 129 |
| <b>Lim Buan Chay</b>                        | The Use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in Lexical Teaching<br>[in Chinese]                                                | 161 |
| <b>Zhao Yilu</b>                            | Differences and Exceptions: An Aspect Calling for<br>Attention in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Teaching              | 175 |
| <b>Yu Mingmeng</b>                          | Chinese "Xing" (star) and Japanese "Hoshi": A Comparison<br>of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enses [in Chinese]     | 187 |
| <b>Diana Yue</b>                            | A Self-learning Model Using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br>Method [in Chinese]                                     | 219 |
| <b>Ong Yong Peng</b>                        | Mongolian Lexis and its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in<br>Yuan Drama [in Chinese]                                      | 233 |
| <b>Phoon Mun Kwong</b>                      | The Phonetic Adaptation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br>Malay Language                                              | 251 |
| <b>Zhou Changji</b>                         | Dialectal Comparison and Textual Examination of Root<br>Words in Dialect: A Case Study in Min Dialect [in Chinese] | 267 |
|                                             | Contributors                                                                                                       | 283 |

# 导 言

◎谭慧敏 林万菁

新加坡是个多语小岛，向来重视以语言作为沟通的工具，特别推行影响深远的双语教育。在这样的大环境底下，我们也许想象这里的翻译和语言对比研究应该比较盛行，这方面的出版物应该比较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翻译，这里的普遍观念是，那不是一门专业，几乎任何有双语能力的人都可以胜任。对于语言学习，这里的普遍认识是，能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需要就好，精通与否另当别论。在多语的环境下，这里的语言学习似乎忽略了语言对比所提供的丰富资源。这里的用语者一般未能充分发挥多语的潜在优势，较少深一层去了解贴近我们生活的语言。因此，尽管接受了双语教育，但真正达到社会语言学中那般定义的“双语人”，为数不多。如果说在全球化进程中，真实疆界在虚拟世界中逐渐瓦解，同时本土化特征又有增无减，那任何语言文化的掌握都会成为今后竞争的利器，而且掌握得越好，就越有利。翻译和语言对比的手段绝对是达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缺乏天然资源的新加坡应该珍惜、善用并开发语言资源。本书收录的十二篇论文，集中探讨汉语和其他语言以及方言之间的各种关系，有总论、研究述评以及翻译理念和语言对比的讨论，凡语音、语汇、语法、语义、修辞、文化各个方面，皆有所涉。本集子并不专注于英语和汉语的对比；相信在信息时代，汉语和更多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会形成气候。筹划此书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加强国人在这方面的意识，冀望略尽绵力，推动新加坡的翻译与语言对比研究。

对翻译应有怎样的认识，书架上不乏研究专著可资参考，但大部分论述给人的印象不外是从事翻译必须对两种语言的结构有所了解；黄邦杰《翻译泛论》则开宗明义地道破其中的关键，具体阐明翻译究竟是怎样的一门艺术。在市面上，依理论来铺陈的文章和就实践经验来议论的文章，代表了翻译界两大流派。邦杰先生是译坛前辈，早年从名师张谷若、朱光潜、卞之琳等，又在中、港、新三地从事大量翻译、翻译教学和双语词典编撰工作五十载。他以半个世纪的学力、经验和成果强调实践为本，不主空谈。其文从实践的角度和历史的深度扼要评述了当前翻译理论界的一些具争议性的课题，如“信、达、雅”和国外翻译理论，深中肯綮。邦杰先生一向重视翻译技巧，《翻译泛论》里论语言差异的处理，亦离不开技巧的运用，以在成果中体现为最后依归。由此文加以引申，就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值得我们思考的也许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多做搭桥和疏通的工作，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再反过来以理论带动批评和赏析。

十九世纪初兴起的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是历史比较法的应用，注重从历时现象追溯两种语言的亲属关系，寻找共同源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是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一种语言研究方法，着重两种语言结构系统及其成分的共时对比，包括一种语言的不同子系统，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言和共同语的对比，共同语内部的对比。一直为翻译和语言教学所用的则是应用对比分析。直至学科的成立，中国语言学界对“比较”和“对比”二词的使用，大体比较宽广，有时并不严格加以区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就2002年春访问英国时的一篇演讲稿作成“English-Chinese Contrastive Studies in China: A Century's Retrospect”。该文首先述及“比较”和“对比”，进而厘清对比分析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源头，再评述中国国内对比分析的研究概况。潘氏同意1977年是中国对比分析研究的分水岭。前此，赵元任、林语堂、黎锦熙、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的鸿文巨著非以推动对比分析为学科而作，乃以建立汉语语法体系为宗旨。但是，这批学者在1933—1977年期间的研究为对比语言学这一门学科在中国的正式成立奠下坚实的基础。1977年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正式把中国语言学界引入新的对比研究时代。然而，迟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才有比较成熟的对比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自然可以明白中国对比研究得益于这个时期欧美所流行的多种语言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功能语法学派，在宏观和微观对比研究方面都比较深入。潘文在结尾时语重心长地提醒现今对比研究者要克服对英语缺乏认识的不足，更要注意对比研究的目的，不可为对比而对比。他指出，在最初，无论是Wilhelm V. Humboldt（洪堡特）、Otto Jespersen（叶斯柏森）还是 Benjamin L. Whorf（沃尔夫），对比的目的都是探讨语言的本质，为人类或国家民族服务；后来，是结构主义者Robert Lado（拉多）给对比订立了新的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服务。中国的对比研究无疑是从外语教学开始的，在对比理论方面，不甚用力。在二十世纪末，越来越多中国对比研究学者意识到不能只关心对比研究的应用层面，而应该以此为汉语语言学服务，解决汉语的问题。文国先生认为这将是，也应该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对比研究的方

向。

1990年杨自俭、李瑞华编《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6年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两本论文集中都录有赵世开、杨自俭和李瑞华对中国对比研究学科在发展的重要阶段所作的方向指导和及时总结，十分重要。文国先生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作百年回顾，对两个发展期几代学者的贡献和不足，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条分缕析，深具意义。翘首前瞻，文国先生对这门学科在新世纪的方向所提出的为汉语语言学服务的看法，切合汉语语言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这方面的努力，1990年代已经开始，李瑞华1996年主编的论文集中收了四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包括徐通锵的《语义句法刍议——语言的结构基础和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初探》（1991）和《“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兼论汉英两种语法结构的原则差异》（1994）。李书高度评价徐文，说是“从宏观上作了对比研究，主要是为了说明汉语的特点。”但是李书也明言选取这四篇文章只因其参考价值，并没有提示这应是对比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的方向。兴起于学术思想这么旺盛的时期，对比研究在中国当然可以朝多元方向发展，包括杨自俭先生提出的对比文化学(contrastive culturology)，可是，如果汉语的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对比语言学在中国的根恐怕无法扎得太深，而对比研究肯定可以在发现汉语特点这一点上有所贡献，也因此应该有更多这方面的建树。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教授卜立德(D.E. Pollard)在谈翻译和对比研究的关系时，曾这么说：“Contrastive analysis means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kind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languages that have to be mediated

in translation. ....If the result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is to produce columns of equivalent constructions for the translator / student to apply mechanically, that would be to tailor a straitjacket. The receiver of the translation, on the contrary, is entitled to expect the language to dress the thought comfortably.”<sup>1</sup>

最后一句不仅说出读者对译文的要求，同时也道出翻译过程中最富挑战之处——怎样处理两种语言中的各种差距。就意义而言，那是语言的深层结构，涉及一些比外在语言形式更深入的问题。言语意义的整体包含了客观的语言文化色彩和惯用表达，这是语义上的距离；还牵涉到主观的写作者修辞手法运用和文学表达，那是文学上的距离。翻译时必须灵活处理多种文内文外因素，拉近种种的距离。对比手法在这里只能帮助分析出差异，最终的译文表达须借助翻译的方法和技巧。郑雅丽“Playing on Meaning in Translation”探讨英、汉及汉、英翻译中词义乃至语义问题的处理。其文立足于Geoffrey Leech提出的七大词义类型（理性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sup>2</sup>、感情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逐一举例说明无论是解读原文还是考虑译文的处理，有系统的、涵摄了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的词汇语义理论，可以帮助解决这方面的翻译问题。郑教授原来专研依存语法和词汇函数理论，对词义问题深有体会。近三年来致力于文学翻译，先后翻译了S. Johnson, *The History of Rasselas*及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本文是她的实践经验之谈，文中所有的译句都是她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结晶。

1 刘宓庆《汉英对比与翻译》D.E.Pollard序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2 Leech原著中用stylistic meaning。中国文献多以“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称之。西方文献有时称为social and stylistic meaning。

语言研究里有许多争议，吕叔湘先生解释为“横看成岭侧成峰”，意谓观点不同，结论各异。同一作品的不同翻译文本，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即对翻译因素的不同考虑，翻译手法各异。关心意大利文学在中国传布情况的意大利学者Alessandra Brezzi（白阿丽）在《地狱篇在中国：但丁的地狱篇在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里，仔细比较了钱稻孙、朱维基、田德望和望维克对但丁《神曲·地狱篇》在形式上、语言风格、中介语（日、法、英）的使用和影响以及语音等各方面的翻译处理。这包括人名“Dante”、作品名称“Divine Comedy”、意大利文学形式“Canta”的中译、神曲第二篇“Purgatory”的译法以及地狱篇中的某些段落的语言和修辞处理。白文客观而详尽地分析四位翻译家的译注以及他们在语言和翻译处理上的得失。这四个版本大概可以作为老舍谈翻译的最佳注脚：“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若作不到，起码译笔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文章的结尾耐人寻味地引了哥德等三位文学家的话，表达了翻译的不可为和无奈，与文章的开场引言“Therefore everyone should know that nothing harmoniz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poetry can be translated from its native tongue into another without destroying all its sweetness and harmony.....”遥相呼应。翻译要追求译作和原著等值，在于文学翻译，特别是对诗歌翻译而言，很多时候只有失望。但是不管翻译理论多模糊，评论标准的定义多不严密，底线还是有的。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时曾说：“一杯伏特加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他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假使变成了一杯白开水，里面还要夹些泥沙，那就不行了。”而无论是成汾酒还是茅台，白文认为无论如

何，所有中译的努力都是对但丁《神曲》的丰富，因此Breezi以意大利人的身份认为“Traduttore-traditore”应该理解为“翻译者—翻异者”，而不是“翻译者—背叛者”。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这个说法1977年由吕叔湘先生提出，渐受重视，时至今日，研究汉语和其他语言之异同的微观对比研究，成绩已经相当可观，尤以语法和语音为重。而语法方面的对比，又以句法和短语结构为主。量词是汉语的特殊词类，由于语法结构上的特殊性及其与名词的密切关系，在英汉对比的应用上有重要的意义，涉及英汉—汉英机器翻译的自动转换、修饰语序等课题，以至对外汉语教学。谭慧敏《从汉英对比管窥汉语名量词》从概念性质、形式和意义分析作英汉对比，希望通过理论的分析可以指导教学。

前文提到对比分析的目的之一是为外语教学作出贡献。自Robert Lado在1957年大力提倡以来，意见纷纭，议论不断。王宗炎《对比分析和语言教学》精当地总结了1960—80年代的意见和四种对比模式。其实，没有什么方法是万全而没有局限的，对比分析尽管有其不足之处，在外语教学方面依然有存在的价值。新加坡最近提出以英语教华语的建议，这个做法原则上是某种对比教学模式，有其应用前提和价值，但并非万灵丹，不能不顾及其应用局限。着眼于新加坡语言和教学环境，林万菁《汉英对比在词汇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切合实际情况，具体论述了词汇教学中应用对比方法的大前提，以及在教学上对比应用可能和不可能发挥作用的层面。对于应运而生的字母词，林氏正面讨论了教学上各种权宜的应对，实事求是，言简意赅。此外，针对汉语构词的特点，林文以比喻性构词为例，说明对比方法不足之

处，反证出语言教学的目的最终是让学员掌握有关语言，方法的使用必须有的放矢。该文就事论事，不偏不倚。

另一方面，着眼于偏误分析，在比利时执教多年的赵伊露关心外族学生按照带有普遍意义的汉语语法规律学习，再加上母族语言习惯的干扰，推导出错误用法的现象。其文“Differences and Exceptions: An Aspect Calling for Attention in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Teaching”讨论了国外学生学习汉语动词时所触发的种种语言差异问题，如动词的函数、搭配习惯、语义、语序、施受者等，从而总结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有必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尽管汉语研究者奉行“例不十，法不立”的金科玉律，语法规律有共性也有个性，例外就是和个性有关。一味按共性教学，给教、学双方带来困扰；而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会进一步深化错误的推论。依露先生的观察是深刻的。

从学习者的角度，香港大学余丹凭着深厚的英文功底和多年的翻译实践经验，撰《为自学者构思一个中译英学习模式》一文，提出一个以翻译为本，建立分类表达方式资料库为用的语文自学模式，不失其实用价值。余丹先生不忘提醒自学者必须持续充实语文知识和文化知识方能成功。

前面多篇文章提及意义上的差异与架桥沟通的方式。说到意义，自然有文化与民族思维在深层上的作用。中国先秦的名实之争，直至清代的经籍注疏，都涉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西方古希腊时代有过两场关于语言的大论争，自此，语言哲学一直指挥西方的文学思潮。不过，首先讨论语言结构和文化精神的是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 Wilhelm V. Humboldt。而首先尝试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

的是一批汉学家，如 Marcel Granet (葛兰言)、Henry Maspero (马伯乐)、B.Laufer (劳佛)等。广义的文化在语言中的影子，由点及面，无所不在。移居日本的华裔学者俞鸣蒙讨论了词汇所折射的文化意义。

《汉语“星”与日语“星(hoshi)”的语言及文化意义之异同》取自自然界物体在汉、日的共有词素“星”如何在构词和运用上突显两种语言在思维和文化上的象征、比喻、引申和色彩意义。一个共有词素竟勾勒出一片文化风情，展现出汉、日在文化交汇后循民族思维在语言上另创的天地，又在发展过程中共同受外语影响，交错发展，同中有异。

语音是语言的另一个要素。对比研究中的语音问题不限于发音上的特征。语言接触中的语音对比，别具意义，翻译和对比学者很关心借词的语音处理。本集子收录了我校王永炳《元剧曲中的蒙古语及其汉语音译问题》和潘文光“The Phonetic Adaptation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两篇论文，一古一今，从语音的角度看词汇的输入和输出。在语言接触中，有生命力的语词会自动调节，融入另一语言中；但是有一部分的语词，尽管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未能融进另一种语言，流传下去，却毕竟是两种语言文化碰撞的火花，在文献上撒下印迹。元剧由于采用诸宫调，杂以道白，所以必须照顾到当时的口语，大量引用方言俗语，而又由于蒙古人喜欢听曲取士，蒙古语词也进入了元剧，不经适当的诠释，索解匪易。据王文分析，元剧中所使用的蒙古语词以借字表音的方式直接进入汉语句式，反映元代老百姓对蒙古语的熟悉程度。元剧曲因此可以真实刻画人物，如实描绘社会面貌，引起当时民间的共鸣。故此，永炳先生认

为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文艺创作者不必回避多元社会所使用的语言。另一方面，文光先生从马来语的视角，看汉语方言词汇输出而进入马来语的结果。东南亚华人多来自中国南方，而生活在巫语区，在沟通过程中，自然输出部分词汇到巫语。这部分语词以闽粤词为主，活跃于低层语言交际场合。巫语吸收的词汇在语音上的处理又以闽语区厦门语音为准。该文讨论了辅音和元音的替代处理，包括如双元音、清塞音、送气和不送气清齿塞音、鼻音等，有助于东南亚各主要方言籍贯的人士认识巫语的语音特征。

回到方言在本族语言内的记音问题，不无研究意义。由于方言词和本字挂不上钩，经常采用训读的方法；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本字的识别往往可以帮助解释古音和方音演变的关系。周长楫《方言比较与方言词本字的考订：以闽南方言为例》谈考订本字须符合音准义合的原则。周教授举出在音的方面，以闽语为例，不妨考虑闽语中的不同方音，如厦门、泉州、漳州、同安、建瓯、莆田、永安等。通过各系属方言的对比，有时可以找到闽语和古吴、楚方言的关系以及其与今相邻的客、赣甚至湘方言的关系，借此追溯源头，进入方言比较的范围。

无论是不是站在世纪之交，信息时代大幅度刺激语言对比的发展与翻译的需求已是不争的事实。新加坡对此不能不提高敏感度。相对而言，新加坡国内各种语言的使用情况在整体上时时受到外界或多或少的影 响。编者生于斯，长于斯，受教育于斯，关心本国的语言发展，是以抛砖引玉，编成本集，希望在广大的对比与翻译研究空间里唤起一二回响。

# 翻译泛论

◎黄邦杰

## 缘 起

翻译可争议之处甚多：佛经的直译与意译之争，鲁迅同梁实秋等“宁信而不顺”与“毋拗而仅信”之论战<sup>1</sup>，至于数十年来对严复“信达雅”一说之拥护与攻击，更时断时续。

近二三十年，西方翻译理论流行于两岸三地，又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质疑和争辩。例如，对“翻译是科学”一说不以为然。又例如，“等值翻译”真能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等值<sup>2</sup>？所谓“传意翻译理论”，到底是翻译理论，还是语言学理论？而语言学理论是否可等同翻译理论？尤可议者，翻译理论，尤其西方的翻译理论，对英汉语之

- 1 先是梁实秋于1928年在《新月》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继而赵景深于1931年在《读书月刊》发表《论翻译》。前者提出“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和“即使误译也胜于死译”；后者提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鲁迅则针锋相对，以“宁信而不顺”反驳。实际上，当时双方限于认识，提法上都带片面性。
- 2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一些翻译学者相继提出“等值翻译”，诸如“信息对等”、“行文对等”、“等值效果”。根据1997年版《中国翻译词典》中《等值翻译》一条所综合（英）卡特福德、（美）奈达、（苏）费道罗夫等人的理论，“等值翻译”的内涵是：“不但要求译作与原作有相同的信息、思想、形象、意境与情调，而且要求有相同的言语节奏、言语风格、言语韵味和言语美学价值。”——这样高的要求，笔者认为可望而不可及的，至多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译者的理想。语系相同的语言之间的翻译也许能做到，英汉—汉英翻译则未必。翻译家朱光潜在《谈翻译》（《华声》一卷四期，1944年）一文中指出：“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是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易办到”。笔者认为朱先生这番话是实在的。